

国有中小企业 转轨改制路径 研究

——以诸城市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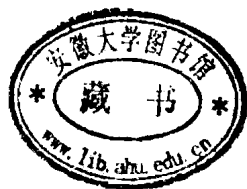
于炳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有中小企业 转轨改制路径 研究

——以诸城市为例

于炳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有中小企业转轨改制路径研究：以诸城市为例 / 于炳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785 - 9

I. ①国… II. ①于… III. ①中小企业 - 国有企业 - 经济体制改革 - 研究 - 中国 IV. ①F279. 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790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张玉霞
出版印制 李 建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2
字 数 153 千字
定 价 2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课题来源、选题依据和背景情况、研究目的、 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3)
第三节 课题的特色和研究方法	(6)
第四节 各篇内容及创新点	(10)
 第二章 诸城国企改制的背景与条件	(13)
第一节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	(16)
第二节 诸城改制前的国有企业改革	(22)
第三节 国有中小型企业改革的紧迫性	(29)
第四节 诸城的地方经济与文化条件	(33)
一 诸城的历史文化概况	(34)
二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37)
三 1992 年前的诸城国企改革	(39)
四 企业改制的直接动因	(42)
本篇小结	(44)
 第三章 企业改制的模式与过程	(45)
第一节 股份合作制	(45)

一 企业改制的模式选择	(45)
二 股份合作制过程描述	(48)
三 改制效果	(52)
第二节 管理层收购	(56)
一 二次改制的起因	(57)
二 二次改制的模式和过程	(57)
三 管理层收购的效果	(60)
本篇小结	(68)
 第四章 诸城改制中的政府角色	(70)
第一节 改制的发动者和推动者	(71)
第二节 政企分离	(77)
第三节 政府主导二次改制的合法性问题	(82)
本篇小结	(88)
 第五章 诸城改制的微观制度设计	(90)
第一节 变革企业产权的思路	(90)
第二节 选择股份合作制的原因	(96)
第三节 改制设计与效果的相关性	(102)
第四节 从股份合作制到管理层收购	(108)
第五节 选择管理层收购的原因	(114)
一 调动管理层的积极性是改革的目的	(114)
二 为什么采取管理层收购的形式	(121)
第六节 效果与方案之间的必然性	(125)
本篇小结	(131)

第六章 诸城改制中的国有资产走向	(132)
第一节 诸城改制中的国有资产结构转换	(132)
第二节 MBO 与国有资产流失	(137)
一 如何看待 MBO 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	(137)
二 MBO 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问题	(140)
三 是否要继续进行国企产权改革? 怎样推进 改革?	(143)
第三节 诸城改制与 MBO	(149)
一 第一次改制不是 MBO	(149)
二 第二次改制与 MBO	(154)
第四节 提高国有资产的利用效率	(157)
本篇小结	(163)
 第七章 诸城改制的经验与启示	(164)
第一节 独具特色的两次改制	(165)
一 内容不同的两次改制	(165)
二 两次改制是一个连续的进程	(168)
第二节 妥善推进配套改革	(172)
第三节 造就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176)
一 建立完善新的企业领导体制	(178)
二 强化企业管理, 提高企业整体素质	(178)
三 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 为搞好企业提供组织 保证	(179)
四 管理与技术不断创新	(180)
第四节 建立健全企业外部市场条件	(181)
一 经理人市场	(182)

二 资本市场	(186)
第五节 与时俱进的诸城模式	(192)
本篇小结	(201)
 参考文献	 (202)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课题来源、选题依据和背景情况、研究目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2008 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也是诸城开始国有企业改制 16 周年。16 年前诸城在全国率先进行国企产权改革，使诸城国企的转轨改制成为国企改革中一个很有影响并且一度引起热烈讨论的标志性事件，诸城模式被人们视为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典型模式，并对后来其他地方的国企改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书就是对诸城国有企业转轨改制的研究。诸城率先在一个县域内较大规模地探索国企产权改革，从全国范围看是地方局部的微观制度创新，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在全国推行的宏观示范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诸城模式是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的一个缩影。正因为如此，诸城国有企业的改制成为研究国企转轨改制的经典案例。回顾与重新审视诸城国企改革，对研究诸城国企的改革进程和探讨诸城的未来发展，自然非常必要。同时，见微知著，窥斑见豹，它对反思整个中国的国企改革

革，特别是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理出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清晰脉络，也不无裨益。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难中之难”，这是所有参与或关心改革的人们的共识。中国的国企改革并未完成，而是正在路上。大型国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指向的改革尚在进行之中。2008年3月，《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仍将“推动国有资产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做好政策性关闭破产和主辅分离”等国企改革问题，作为本年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可以说，我国正处在一个国企改革的关键时刻，国有企业改革的延误或者失误会对国家经济的增长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笔者希望这项研究对于正在进行的国企改制也能有一些借鉴意义。

本书主要考察诸城国有企业改制的历史背景与条件，描述企业改制的两个阶段即股份合作制和管理层收购，及其各自的起因、方案和效果，考察产权制度变化与企业发展的关系，以及国企改制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这种考察不是静态的分析而是动态的探讨，它不局限于诸城国企改制本身，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环境中加以审视。这种探讨也不是只在分析诸城改制的原因时才追溯历史，而且也将诸城改制放在后来的全国国企改制的历史进程中来讨论。诸城改制是成功的，但是一些地方效仿诸城模式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诸城是以实行股份合作制开始产权改革的，后来一些实现股份合作制的国企却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引起人们对股份合作制的质疑；诸城是以管理层持大股的方式完成改制的，后来管理层收购式的国企改制即MBO却因为国有资产流失而引发2004年的“郎顾之争”，

并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是否进行国企产权改革的激烈争论，最后国资委不得不出台若干措施进行干预。诸城模式在诸城的成功与它在更大范围内所遇到的挑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诸城改制成功的内在必然因素。所以，本书不仅要考察诸城改制的原因、方案和效果，还要通过深入探讨，显示改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关系，即原因与方案之间、方案与效果之间本来所具有的必然联系，以及诸城改制的经验与启示。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始于1992年的诸城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最早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一，在全国报道之后，立刻产生了强烈反响，受到各界的极大关注，人们称之为“诸城模式”。诸城国有企业改制至今已经过去16年了。在这16年中，诸城的企业经营、产业结构、城市竞争力、资源配置、城乡就业、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城市建设等方面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中央领导、许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对诸城改制的考察也几乎没有中断过。先后有26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诸城考察改革工作，全国各地数十万领导干部前来诸城学习改革经验^①。而学术界和理论界对诸城模式的探讨和争论也从未停止过，早期的不必说，从2004年经济学界的“郎顾之争”到2007年底和2008年初的“改革反思大讨论”，诸城模式都成

^① 张则信等：《改革激活了诸城——“品牌诸城”解读之活力篇》，《潍坊日报》2006年3月15日。

为人们回顾、反思国企改革成败得失和筹划国企当下改制的一个重要参照。尤其是关于“管理层收购”的大讨论将诸城的产权改革推向焦点，并引发了诸城两次改革孰是孰非与孰优孰劣的争论。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诸城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历史地位和对于今日国有企业转轨改制的意义。

关于诸城模式的各种报道和讨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进程中，企业转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涉及的产权交易和存量资产流动、重组的成效，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关键。作为中小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改制途径。诸城模式是股份合作制的成功模式。这种研究肯定诸城模式的效果，认为通过企业改制，职工收入中增加了资产收入，总收入比改制前大幅度增加；企业改变了机制，建立了新的治理结构；政府职能也相应转变，撤销了各行业主管局，减少了对企业的干预，而且地方财政收入也增加了。这种观点认为诸城国企转轨改制就是指从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它把诸城国企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看成诸城国企改制的全部内容。它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诸城在对改制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不久，就废除了这种形式。显然不能把股份合作制看成诸城改制的全部内容和成功标志。

第二种观点将管理层收购看成“诸城模式”的主要内容。它并不否认“诸城模式”使改制后的企业效益趋好，但认为“诸城模式”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一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二是管理层收购的合法性问题。陆满平博士就职工之间的股权挂靠问题指出：“私人之间是不能进行股权托管的，这种行为缺乏法律支持，容易引起法律民事纠纷。比如托管方如果出现

车祸等非正常死亡，完全可能出现被托管的股权被侵占现象，这时被托管方的权益将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且，“诸城模式”中的以当地政府为主导的股权定向转让问题，也缺乏法律依据。“转不转，转让给谁，完全是股东自己的自由，定向转让没有法律政策依据。即使现在股权转让做完了，职工还是可以起诉地方政府。”^①

第三种观点认为诸城国企改制包括两个阶段或者分为两次改制。它肯定第一阶段的改革是合法的和成功的，但认为第二阶段的改革缺乏正当性与合法性。这种观点认为，1992年诸城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是政府同意，职工自愿的，也符合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精神。诸城企业的全体职工用自己的钱买下了企业的全部产权，就已经成为合法的股份有限公司，任何人也没有权力，不经过全体股东表决，就越俎代庖把股份合作制彻底推倒重来，强制职工退股，强制推行管理层持大股的管理层收购。因而第二阶段的改革缺乏正当性与合法性。

第四种观点认为诸城的第一次改制实际上是不成功的，是国企改革中的一段弯路，“二次改制”刷新了“诸城模式”^②。理由是通过股份合作制的第一次改制，虽然大多数改制企业由死变活、由亏变盈，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特别是由于平均持股，经营者所持股份份额太小，缺少足够的责任感和压力感，新的“小锅饭”局面形成，改革又开始陷入困难。改革不得不进入调整阶段，被迫于1997年开始二次改制。在这种

① 蒋培宇：《12年诸城国企产权改制 亿万富豪批量生产》，《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2月1日。

② 胡定核：《从山东诸城模式解析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观点看来，诸城为了避免争议，在第一次改制中没有触及深层次问题，因此强调改革不能拘泥于形式，要大胆地试，只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改革才能真正改出成效。它认为诸城的改革走了些弯路，经过二次改制以后才与全国同步了。并且认为诸城的代价就是其他地区借鉴的经验，让这些地区少走了弯路。在这个意义上，诸城先走一步而比后来者多付出好几倍的努力是值得的。

第三节 课题的特色和研究方法

应该说，过去对诸城改制的报道和讨论特别多，也有一些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延中和胥和平所著的《诸城企业改革探索》以及黄少安关于诸城改制的系列论文。前者将诸城改制置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但由于这部著作出版于1996年，它主要是对诸城改制第一阶段即股份合作制的回顾和反思。后者虽然对诸城改制的两个阶段都进行了考察，但它主要是对具体的改制过程的描述和分析，较少从宏观背景上给予探讨。此外，以往对诸城模式的研究中基本没有系统讨论当地的历史人文因素对诸城改制的影响，而对诸城改制的各环节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也有待深入系统地研究，对诸城进行市场化改革10多年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待于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进一步展开。

本书尝试运用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诸城的经济发展作一探讨和解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本书用以分析诸城改制的手段之一。诺思和戴维斯认为，制度安排之所以会被创新，是因为有许多外在性变化促成了利润的形成，但

是，由于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困难、厌恶风险、市场失败以及政治压力等原因，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因而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或变更旧有制度安排）。一项新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才会被作出。因此，尽管在历史上可能存在许多可以获取的潜在利润，但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形下才会发生制度创新：（一）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二）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合算了。对于第一种情形，比较明显的有，市场规模的变化会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收益和费用；技术变迁会使得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有利可图；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的预期会使得他们对新制度安排的收益与费用作出重新评估。对于第二种情形，如一种安排的组织成本已由另一种安排所支付，则这一安排创新的成本会显著降低。制度安排的创新到底会选择哪一种形式，这取决于每一形式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受影响团体的相对市场和非市场力量。一般地，个人的安排不需要支付组织成本，也不要支付强制成本，但收入的增长只限于一个人。因而制度创新的外部收益不大。而自愿得到个人之间所达成的合作性安排，参与其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退出，因此，它要支付组织成本，但没有强制成本；而政府性安排则没有提出退出的选择权，因而它既要支付组织成本，也要支付强制成本，不过，由于它在作出决定时不需要有一致的同意，只要符合相互认可的组织程序即可，它要支付的组织成本可能要低于自愿安排。为了选出一种最有利的安排，决策者将会比较各种可选形式的净现值，并从中选出一个最大净现值的安排形式。

V. W. 拉坦《诱致性创新：技术、制度与发展》认为，制

度变迁不仅是对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而且也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以及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正如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进步会使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一样，社会科学知识与商业、法律、社会服务、计划等方面的知识进步，也会使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右移，而且这些方面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创新的成本。

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前者是指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后者是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又可分为正式制度变迁和非正式制度变迁。

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理论都会运用到。但是近 30 年来发生在中国的转轨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而又前所未有的事件。没有哪个现成的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这场已经对中国和世界的经济产生了如此重大影响并且还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对比较完善的经济制度有很好的描述和研究，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也有很多的研究，但是对如何从计划经济制度转向市场经济制度的中国式经济改革，并不能提供很好的经济学说明。实际上，近 30 年来中国超常和超速的发展，导致流行的一些西方理论正在不断地失效或被证伪，西方的许多经济学家为之感到迷惑不解，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把中国的非凡经济表现视为一个谜。经典理论被证伪代表了社会进步，也预示着新理论的诞生。西方经典理论与中国发展现实互相矛盾，需要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与文化论证基点上的“中国特殊论”来解决。如果中国发展能够持续成功，“中国特殊论”也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同。这是最近中国经济学界和西方经济学界的新动向。

根据这一最近的经济学进展，本书在对诸城两次改制的探讨中将不拘泥于已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而更多地从改制本身出发，采用历史发生学的方法，在诸城改制的境域中即社会经济环境中来考察这场改制的发生和进程，特别是诸城改制的不同阶段之间以及每个阶段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的或偶然的关系。通过这种探讨，分析改革进程中主要要素，即改制前企业的经营状况、改制的起因、个人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因素、改革方案以及改革效果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同时，也讨论改革过程中偶然因素对改革效果的影响，解释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建立过程，并通过对诸城国企改制后的经济运行和绩效作一客观的描述，对改制企业的资料和数据进行客观的分析，考察产权和制度改革后，由于所有权的变化而导致的企业的运行效益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产业结构、资源配置、城市竞争力以及就业、税收等方面的变化。呈现其时代的与历史的价值和具体的特征。

这样做并没有否认这场改革的开创性和历史价值，而是意在表明任何改革都是在一定环境中进行的，任何改革措施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国企改革者并不是脱离环境或不依赖任何环境，而是能够敏锐而深刻地洞察环境，善于运用环境因素来引导企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对诸城改制的成败得失有一个确当的评价。也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诸城模式中所包含的真谛，即哪些具有普遍的推广价值，哪些对诸城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因此，本书通过收集和研究诸城企业改制的资料，运用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借助对于当地文化的亲身体会，通过系统考察改革的制度基础、文化传统背景和所有权的变化所导致的企业绩效的变化，探讨改制的两个阶段及其各主要环节的内在相

关性、产权制度变化与企业发展的关系以及国企改革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对于人们所关心的改革中出现的职工权益和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等问题，也会有相应的分析。

第四节 各篇内容及创新点

第一章引言。对课题来源、选题依据和背景情况、研究目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文献综述、课题的特色和创新性及拟采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描述。

第二章考察诸城转轨改制的条件。从宏观制度、改革背景、地方经济和历史文化等方面讨论诸城改制发生的历史原因、现实依据及经济与文化基础，对诸城改制得以实现的条件给以描述和分析。诸城改制是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县域中小国企不同于大型国企，它们一般不可能获得依托形成权力的垄断性地位或经营条件，背负着国企的一切负担，又没有大国企的垄断性资源，这些企业的改革实际上具有更明显的紧迫性。

第三章描述诸城企业改制的模式与过程，探讨企业改制的模式选择、阶段进程和改制效果。诸城的国企产权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为特征不同的两个阶段或者两次改制。这两个阶段或两次改制的内容虽然都是产权，但改革方式是大不一样的。第一次改制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第二次改制以管理层收购和持大股东为主要形式。通过两次改制，使诸城的企业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基础。

第四章讨论诸城改制中的政府角色。诸城的国企产权的两次改制都是由政府推动的，尤其是第一次改制主要是在政府的